

权威的表征:对贵州清水江流域苗寨 “土地菩萨”信仰之探析

□徐英迪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在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村寨里,以“土地菩萨”为对象的信仰形式,在其信仰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土地菩萨”对当地人来说不但是象征公平正义的保护神,而且对“土地菩萨”的信仰是村寨中血缘组织表征其权威的展台,折射出各个血缘组织在村寨中的等级地位,并隐含着各血缘组织对生存资源的竞争。时至今日,这种信仰形式对于村寨社会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秩序的建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土地菩萨”信仰;土地庙;权威;血缘组织

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44(2011)05-0018-04

一、引言

每个共享一种文化的社会群体,都有完备的文化体系来维持与控制其社会的有效运行。宗教信仰作为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对整合社会内部的凝聚力,维系社会本身的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宗教信仰对社会延续的作用是基于其使社会组织神圣化,巩固社会组织的权威性。正如杜赞奇所说,象征符号、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都是政治性的,而宗教信仰作为其中一种象征规范,它的象征性的价值在于它的权威性^{[1]P2}。在笔者调查的苗族村寨龙塘自然寨^①中,其信仰体系内对“土地菩萨”的崇拜对当地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寨中隶属于不同血缘组织的土地庙,不仅是各个血缘组织凝聚内部认同的象征性标志,更成为表演他们象征性力量的舞台。在这里,土地庙本身创造了一种权威制度,成为村寨中血缘组织权威性的表征。

二、土地庙的划分问题

贵州省施秉县双井镇的龙塘自然寨,有近

300户人家,人口约1500人。苗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97.4%,其余为汉族,是一个以邵姓为主要姓氏的杂姓村寨。当地传统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以血缘为基础,个人依附于他所在的血缘组织而分群相依。从该寨民居的整体居住布局来看,整个寨子被分为邵家上寨(邵氏第三公的家族)、邵家中寨(邵氏第一公的家族)、邵家下寨(邵氏第二个公的家族)、吴家院、刘家院、龙家院等相对单独的区域。龙塘寨主要有四处土地庙,这四处庙宇大致处在村寨的入口并临近于其所属血缘组织的聚居地。

“清水江、潯阳河两岸和海拔较低地区,每寨都有土地祠。如几姓共寨,多是一姓一座,设于本姓住区的村口,各姓自行供祭。”^{[2]P66}位于清水江流域的龙塘寨亦有一个姓氏有一个土地庙的说法,这里的土地庙是以血缘为标准而划分归属权的。村寨中有三个土地庙位于寨口,从北到南,首先是通往双井镇上的新寨口,此处的土地庙属于居住在附近的汉族居民所有;接着在寨子的西侧

*收稿日期:2011-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以来地方文化资源与乡村权力运作研究”(编号:06BMZ026)。

作者简介:徐英迪(1982-),汉族,辽宁沈阳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2009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临近邵家中寨通往双井镇上的老寨口,此处的土地庙是邵氏第一公的家族的;最后寨子的南端通往施洞镇的寨口,此处的土地庙被称为吴祖庙,属于居住此处的吴家。另外临近邵家下寨与邵家上寨的地方亦有一处土地庙,关于这座庙归属权的说法颇多,可能属于邵氏第三公的家族或邵氏第二个公的家族的,也有可能是两个家族共有的。这四个土地庙均归属于不同的血缘组织,敬庙的权力也基本上限于血缘组织之内部的人员,并以此成为人与人之间界限划分的标志。

三、土地庙的等级问题

龙塘寨的土地庙在村寨中的地位并非完全等同,庙宇神圣性权威的等级是与其所属血缘组织势力近似于正比例关系。而村寨中的人们从历史记忆和现实状态等方面寻找的话语,是增强各自所属土地庙的神圣性权威的依据。寨上人们的观念中认为每个姓氏都应有一个土地庙作为该姓氏的保护神,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姓氏都有拥用此种土地庙^②的实力。如今寨子里只有邵家与吴家有保护村寨的土地庙,所以对土地庙的等级地位之争便从这两个姓氏开始。

第一,吴家庙与邵家庙的权威之争。在1949年以后,龙塘寨的土地庙和其他地方的庙宇一样均被毁坏,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家政策的松动,邵家便在此时重新修建了土地庙。而之后吴家在1996年重新修建了吴祖庙,并且从修建的规模上看是寨上最大的庙宇。吴家与邵家都有通过新建土地庙来达到增强本血缘组织权威的愿望,因此各自庙宇的等级地位便成为两个姓氏争论的焦点。从庙宇的起源上看,吴家认为吴祖庙是寨上最早也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庙宇,每年农历九月份的敬庙活动便以吴祖庙为始。而邵家提出吴祖庙的初始并非属于吴家,最先到达龙塘寨的居民是邵家与龙家,而现今吴家居住的位置是寨中最早的土地庙所在的位置,庙宇是被吴家后期所占而致。另外从“土地菩萨”的性别来看,邵家认为邵家庙供奉的“土地菩萨”为男性而吴家的为女性。事实上,从外观看吴祖庙中供奉的神像为女性,但吴家人的言论中却一直强调其为男性。不难看出吴家人意在打破与邵家庙的从属关系,使吴祖庙可以脱离邵家庙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个体。因为村寨里的人们多数都把吴祖庙与邵家庙相联系,并认为吴祖庙在邵家庙的等级之下,吴家的“土地菩萨”是邵家的下属。寨民们以男女在

社会性别上的不平等来表述吴祖庙与邵家庙之间的关系,进而成为印证邵家庙具有较高地位的根据。最后吴家虽然修建了村寨中最大的土地庙,但村民依然认为邵家的庙宇才能保护、管理并且代表全寨,而吴祖庙的能力被定义在了吴家的范围之内,只保佑与代表吴家。在村民心中土地庙的管辖范围与庙宇的外在形式无直接的关系,而本质上在于其背后的血缘组织的势力,这也是吴祖庙在村寨中位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所在。

第二,邵家内部关于土地庙权威的认同。在龙塘寨姓氏与土地庙并非一一对应,有些姓氏没有土地庙而邵家因为人口的优势却拥有两处庙宇。一处邵家庙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重建,而另一处却至今尚未修复。对于邵氏之外的人来说邵家是一个整体,并认为这个已修好的邵家庙是属于整个邵家的且在村寨中最具有权威性,而事实上它仅归属于邵氏第一公的家族。另外在邵氏的内部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认为尚未重修的土地庙才是寨中最大的庙宇,此处庙宇要比已修复的庙宇的权威还要大些。

第三,被边缘化的汉族的土地庙。汉族居于龙塘寨的最北端,此处的土地庙便由汉族的村民所有。他们认为此处土地庙位于村寨的入口处,与其他苗族的庙宇具有同样的地位,但事实上却得不到全体寨民的认可。这里的苗族认为汉族的土地庙是用于敬桥的小土地庙,就像他们本身一样是不值得一提的。汉族对龙塘寨的势力格局造不成任何的影响,他们在村寨的生活中处于边缘的地位,常常被忽略而不被顾及。

从总体上看,土地庙的等级基本上与血缘组织在村寨中的地位相应。虽然寨民对土地庙权威的等级各有争议,但在当地传统节日正月十五玩龙灯的路线中可见此秩序的排列。玩龙灯时“龙”要巡游全寨并进入每家每户,之后走出寨子到其他村寨去玩龙。巡寨期间每逢保护村寨的土地庙便需敬拜以求平安,这个过程便以尚未修复的庙为起始祭祀,接着是邵家第一个公那支的庙,最后是吴祖庙,而汉族的土地庙又一次被忽略了。当询问寨民们土地庙是否有等级的差异时,多会得到否定的答案,但在实际上玩龙灯时“龙”巡游村寨的过程中,对几处土地庙祭拜的顺序已经隐性地界定了土地庙的等级。对于整个龙塘寨来说邵家的庙宇是主管,吴家庙的是下属,而邵家内部中未修复的土地庙处于最高的等级,最后汉族的

土地庙并未被列入这一层次的排列之中。

四、土地庙的资源化问题

自1949年之后,龙塘寨拥有传统权威的大家族受到了打压,一些在传统社会中不受重视的小的血缘组织借助国家的权威成为了村寨中的主要力量。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管理的松弛,传统权威有了复兴现象。就今天而言龙塘寨的寨民在现代权威与传统权威的双重作用下,同时依附于不同的权威形式来获取生存资源和社会地位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20世纪80年代,寨上邵氏第一个公的家族最早修复了土地庙。从庙宇的建造过程来看,是人们冒着很大风险并且十分艰难地偷偷修建的。而当时作为这个土地庙的主人即邵氏第一个公的家族,其成员一直没有人能进入村寨的村委会^③中,其家族在村寨中处于劣势,所以急切地需要重修土地庙来支撑本家族在村寨中的地位^④。在重建庙宇之初这支邵氏家族把敬庙的权力限制于本家族之内,而引起了与其同属一个酒堂^⑤的另一支由杨姓^⑥改为“邵”姓的家族之间的矛盾。据说新建成不久的土地庙内的神像被扔到了沟里摔成四截,虽然没人指明,但大家都默认为同酒堂的杨家所为。为了解决矛盾,土地庙的主人允许杨家拥有敬庙的权力,如2006年农历9月整个酒堂一起进行敬庙活动。这支邵家的做法似乎是很懦弱的,这与当时各血缘组织在当地的势力相关,杨家在当时的村委中有人出任其中重要的职位,这是邵家屈服的主要原因。而杨家对敬庙权力的执着根源于他们希望扩展本血缘组织的生存资源,土地庙在当地是传统权威物化的标志,获得敬土地庙的权力就意味着杨家拥有了这种象征性的权威资源。

邵家的另一处庙宇一直没有重新修复的原因除了归属感问题,主要是这两支邵姓家族各自在村委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他们并不急于寻找新的权威资源。

在血缘组织内不同成员对“土地菩萨”的敬奉也存在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与个体成员在现实中的具体生活状态相关。例如邵EJ家由于成分不好,不可能在国家权力占主导地位时得到实惠,反而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所以把重心放到了敬土地庙上,并以一个家庭的身份杀了一头猪的方式来表示对“土地菩萨”的崇拜,展现了对传统权威形式的依赖。与之相反,邵ZHG家世代在

村委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他家祭拜的首要对象应该是给予其权力资源的国家,而“土地菩萨”退位其后了。

对土地庙的敬畏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血缘组织及其成员的生存状态。当人们无法在村委之内找到自身的立足之地时,人们感到自身潜在的或已经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时,各个血缘组织的有心人便对根植于当地社会的传统权威进行再利用。通过重新修建土地庙或组织祭拜来展演血缘组织的力量,以便巩固内部凝聚力的整合,明确外部界限的划分,重新塑造血缘组织的权威。

五、传统权威的延续性

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各地的村落中都有宗教信仰复兴的现象,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表现,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传统权威的崛起,而在实质上我们应视为传统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在各地的村落中依然有效的运行。对传统权威之外势力的借用,无疑是在传统文化规范下处于弱势的人们改变其地位的好方法。

苗族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均质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个人与群体相比,群体意识要大于个人意识,个人要服从于群体并被禁锢于群体之中。每个人都被划分到不同的群体之中,个人的身份首先是由他所在的群体所确定的,个人所在群体的等级与地位是个人今后是否可以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虽然1949年以后村寨中的传统权威被压制,使在传统权威之下处于村寨权力边缘的人们有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但随着国家对乡村控制的减弱,这些人便逐渐地从村寨的权力中心中退出。如现今杨家已从村委会中完全退出。

从本质上看,以血缘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得以持续性的发展,其动因在于村寨中关联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个人的人际交往限于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中,个人的交往范围受到血缘组织大小的限制。近些年虽然村内外出打工的人很多,但其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却改变不大,主要的人际关系依然是以血缘组织为基础而展开的。另外几乎很少有人可以在外地立足,大部分的人最终都会回到龙塘寨。同时相对来说,外部社会对个人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而村寨本身是个人最后的依靠。个人最终回到龙塘时,如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在村寨中是很难立足的,所以这张社会关系网对每个人非常重要。如在各血缘组织举办集体敬土地庙的活动

时,外出打工的人家也会凑份子参与此活动,是保持与当地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

传统权威对个人作用具有绝对的优越性,特别是它可以惠及子孙具有延续性。如郇GM当村支书时,在村上的行为极为霸道,为人敬畏。当其从村委会中退下后,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同时没有强大的血缘组织背景为依靠^⑦,使其迅速地失去了所有的权威资源,重新退回为村寨中边缘的人员。国家权威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延续性的,没有血缘组织为后盾,在村寨中个人是无法维持争夺生存资源的有利条件的。而为了个人及其后代都可以在龙塘寨幸福的生活,人们最终目标指向于传统权威是不言而喻的。

六、结语

杜尔干认为神乃是社会的自我神化,宗教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3]P10}。村寨内人们的行为方式,如对土地庙重建与祭拜的主动程度差异,均折射出人们对社会力量本身的崇拜。在当地人们对“土地菩萨”的信仰过程中,血缘组织的权威得到再生产,整个村寨内部的社会界限得到强化,并在其过程中使深藏于社会现象之下的社会结构与其秩序得以展现。村寨中传统社会关系网的稳定性,是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借用多种途径获取生存资源时,依然倾向于传统权威的根由。由此可见在现今乡村中各种传统权威的复兴现象,其背后有着重要社会根源,即在于其传统社会关系网的稳固性,所以这种权威形式对乡村社会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注 释:

①笔者于2008年7月到2009年8月期间在贵州省施秉县双井镇龙塘行政村龙塘自然寨做了3个月左右的田野调查。

②土地庙:龙塘寨的土地庙分为两种,一种是建于村口,防止恶鬼进入村寨,保护一方平安,有保护寨子作用的土地庙,当地人称其为大土地庙;另一种是二月二敬桥节祭拜的土地庙,是保护桥的土地庙,这里的敬桥节敬的桥既可以是指建于河水或深沟之上的石板桥或木板桥,也可以并且主要是个人在其居住地附近搭于小沟沟上的石板或木板,而桥的主人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敬桥来求得子嗣,当地人称其为小土地庙。本文主要探析的土地庙是指大土地庙。

③在村寨中的村委会掌握着国家资源,代表着国家权威。

④吴祖庙重建的时代背景以及目的性多有类似之处。

⑤酒堂:当地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主要是一起陪客与喝酒,有事互相帮助。酒堂可以分为血缘酒堂、拟血缘酒堂,是人们结群与联姻的方式之一,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因之成了划分群体的一种方式。

⑥由杨姓改为“郇”姓这一支家族,原来居住在龙塘寨主要居住区之外,后因安全需要迁入寨内聚居地,因怕被欺负便由杨姓改为“郇”姓,因居于郇氏第一个公的家族聚居区附近,便与其为同一个酒堂。

⑦郇GM家祖上为汉族,后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而改为苗族,在村寨中苗族人认为他家是汉族,汉族人认为他家背叛了汉族,所以他的身份是十分尴尬的。

参考文献:

[1][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明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上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3][法]E.杜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M].林宗锦,彭守义译.凌耀华校.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李锦平

Representation of Authority: A Study on the Faith of “Land Buddha” in the Miao Villages of the Qingshuijiang River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XU Yingdi

Abstract: In the Miao villages of the Qingshuijiang River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the faith of “land Buddh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t is a protecting god for the local people, symboliz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The faith is a platform for blood relation organizations to display authority, suggesting competitions for survival resources. Even in these days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formation of villages’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order.

Key words: faith of “land Buddha”; land Buddha temple; authority; blood relation organization